

持 续 中 国 丛 书

Sustainable

主编·杨开忠

# CHINA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

## 中国西部 大开发战略

◎杨开忠 等·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 中国西部 大河

黄 河  
长 江  
雅鲁藏布江  
大渡河  
岷江  
嘉陵江  
乌江  
汉江  
渭 河  
洮 河  
湟 河  
洮 河  
湟 河

续 中 国 丛 书

主编·杨开忠

# CHINA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大项目（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综合研究）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中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 中国西部 大开发战略

◎杨开忠 等·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杨开忠等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1. 10

(持续中国丛书/杨开忠主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

ISBN 7-5406-4635-7

I. 中… II. 杨… III. 西部大开发(中国)- 经济发展战略 - 研究 IV. F120.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0699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市桂城叠南)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337 000 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406-4635-7/F·23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电话: 020-87616267)联系调换。

# 总序

吴树青 杨开忠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变落后的社会面貌；另一方面，又不能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就成为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以及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和科技水平都比较落后，本来已经短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越来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加剧，国民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发展受到了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和日趋严峻的国际环境贸易壁垒的挑战。

由于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被破坏，各种自然灾害频繁，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仅 1998 年长江特大洪灾就夺走 2000 多人的生命，造成财产损失近 2000 亿元人民币。这场洪水的成因固然与反常的气候变化有关，但是长期以来

长江上游地区对森林的过度开采，造成森林覆盖率锐减、水土流失现象严重和陆地的保水能力下降，再加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量围湖造田，造成河道泥沙淤积、泻洪区日渐缩小，都不能不是造成这次洪水的重要原因。

严重的环境污染也极大地威胁到中国人的身心健康、智力发展和生存质量。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目前中国大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中国 10 个最大的城市均在世界污染状况最严重的 20 个城市之列，即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一半在中国。每年中国大城市有近 17.8 万人死于污染引起的各种疾病。一些城市儿童血液中的铅含量过高，比一般认为对智力发展有危险的水平还高出 80%。在农村地区，用煤或柴草取暖和做饭污染了室内空气，每年导致 11.1 万人死亡。据估计，1998 年全国因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4000 亿元。

同时，随着地方利益越来越突出，各个地区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黄河这条曾经孕育了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母亲河”，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频繁地出现断流。据报道，1972～1999 年的 27 年里，黄河共有 21 年发生了断流。在 90 年代以前，断流最早发生在 4 月中旬，一年内断流时间一般不超过 90 天；而进入 90 年代后，断流最早发生时间提前到了 2 月份，一年内的断流时间最长竟达到 227 天。每年的 5、6 月份，黄河几乎成了一条内陆河。断流给黄河下游的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围绕着如何公平、有效地分配十分有限的水资源，黄河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之间、下游各地区之间的区际关系协调的难度增大。据统计，1992～1996 年间，因黄河断流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268 亿元。

面对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挑战，我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持续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91 年 6 月，中

国政府发起召开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原则，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作了充分准备。随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年7月，即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不久，我国决定由国家计委、国家科委牵头组织国务院各部门共同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和第一批优先发展项目计划，这些计划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和帮助，被列为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正式合作项目。1992年8月，中国政府提出“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明确指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中国当代以及未来的必然选择。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1995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这次全会正式把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国家战略。此后，在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又将可持续发展同科教兴国并列作为我国必须实施的国家战略，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从此，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到1999年为止，中国已经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上都成立了“21世纪议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分别制定了国家、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等不同层次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从行业政策的制定上看，国务院许多部委已经或正在制定本行业的21世纪议程或行动计划，已经颁布的行业规划主要有《中国21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劳动事业发展战略》以及《中国水利21世纪议程》等等。

我国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具体措施，就是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中。1994年7月，国务院发布37号文件，要求各级政府和部门将《中国21世纪议程》作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将议程中的思想纳入到各项计划和规划中去。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并明确作出了中国今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各个部门、各个地方也将可持续发展纳入了本部门、本地方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以及具体行动计划。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原则，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保证。90年代以来，我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立法进程明显加快，执法力度大大加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逐步走上法制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九五”期间修订和颁布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主要有“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节约资源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暂行规定”等，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资源、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到目前为止，中国已颁布了6部环境保护法律、9部自然资源管理法律、30多部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行政法规、30多部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364项各类国家环境标准及600多项地方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法规，初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与资源法律体系框架。

我国政府积极开展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宣传工作，组织和动员社会团体及公众参与。我国各级政府及社会团体举办可持续发展培训班，并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等媒介在中国广泛地宣传普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中国社会各界

和各社会团体积极拥护可持续发展思想和战略，尤其妇女界、科技界、少数民族、青少年、工会和农民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活动已取得积极进展。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也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1994年和1996年，我国政府分别召开了第一次、第二次中国21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目前我国与加拿大、荷兰、挪威、瑞典、美国、德国、法国、丹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盟、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IFAD)、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国际组织就可持续发展领域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一批批重大项目已经启动，如中欧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合作计划、气候变化国家研究、建筑节能等优先项目，亚洲开发银行援助的“环境无害化技术转移中心”项目和UNDP援助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网络计划”等。在已启动的项目中，仅1994~1996年的累计投入就高达12.9亿美元。

可见，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重视，无论是理论模式，还是战略实践，都取得了巨大进展。追求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决心。

## 二

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热潮，但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出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和环境消费观，不同学科、不同部门则出于其所提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不同，各自所强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模式也就不尽相同，并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倾向。

在布伦特兰报告中，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的关键目标是以下六

个方面：① 复兴增长；② 改变增长质量；③ 满足对工作、食物、能源、水和环境卫生的基本需求；④ 保护和改善资源基础；⑤ 重新界定技术和管理风险；⑥ 在决策中将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中国虽然广泛地接受这一概念的基本精神，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十分关注和强调在环境和发展面前各国享有平等的权利，即所谓代内公平，特别是国际公平及与此相应的新的国际秩序，它与代际公平一样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的质的规定性。因此，1997年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就全球而言，中国同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十五届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即“可持续的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而且决不包含侵犯国家主权的含义”，“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走向国家和国际的公平”，“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要有一种支援性的国际经济环境，从而导致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这对于环境的良好管理也是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的。可持续发展还意味着维护、合理使用并且提高自然资源基础，这种基础支撑着生态抗压力及经济的增长。再者，可持续的发展还意味着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与考虑，而不代表在援助或发展资助方面的一种新形式的附加条件”。

迄今为止，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可操作性定义分为以下两类：一、从环境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这类定义的重点放在环境保护。国际上有代表性的这类定义有福曼定义、国际生态学联合会和国际生物学联合会定义。福曼认为，可持续发展旨在“寻求一种最佳的生态系统，以支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人类愿望的实现，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得以持续”。1991年11月，国际生态学联合会和国际生物学联合会在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我国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工作者以及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更多

地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并贯彻可持续发展。二、从发展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这类定义的重点放在发展。国际上这类定义中比较全面的是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发表的定义，即“在生存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我国的社会科学家和经济、社会、科技等部门多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和强调可持续发展。由于强调的发展内容不同，着重从发展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又可进一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从社会发展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布朗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指“人口增长趋于平稳、经济稳定、政治安定、社会秩序井然的一种社会发展”；奥尼尔则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现在和将来给社会上所有的人提供充足的生活保障”。我国的社会学家及社会发展部门多数倾向于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可持续发展。

(2) 从经济发展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巴贝尔在《经济、自然资源、不足和发展》一书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和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皮尔斯的定义为“自然资本不变前提下的经济发展，或今天的资源使用不应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世界自然资源基础的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学家及经济部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这样理解和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3) 从科技进步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司伯斯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转向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尽可能接近零排放或密闭式工艺方法，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有关研究则认为，污染并不是工业活动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技术差、效益低的表现，因此，他们下的定义为“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极少产生废料和污染物的工艺或技术系统”。我国的科技部门更多地从这种角度强调可持续发展。

(4) 从区域发展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世界是一个多区域系统，各区域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一个区域的发展可能是以牺牲别的区域甚至整个区域系统的发展能力为代价的。然而，由于外部不经济，这种发展终究是不能持久的。这就意味着，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应处理好代际关系而且也应处理好区域之间的关系，在可持续发展概念中既应包括时间维也应包括空间维。因此，从区域发展角度来讲，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地现在和未来的需要又不危害整个区域系统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

我们认为，应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一个多目标、多维度的弹性发展框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根据自身处境的特点和需要对这个发展框架中的各个目标和维度给予不同的权重，从而选择不同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模式。中国是一个发展国家，因而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中赋予发展目标以较高的权重，从而选择了以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1992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与发展报告》明确指出：“对于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面临着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讲，贫困和不发达是环境退化的最根本的原因。它们长期处于贫困、人口过度增长、环境持续恶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打破这一循环的根本出路在于保持适度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增强其保护自身环境并积极参加国际环境保护合作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更是鲜明地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目的和任务在于让全人类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1) 让包括子孙后代在内的全人类在美好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的生活。关于可持续发展基本目的的概念是建立在环境价值观基础上的。环境价值是人对环境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基础。一个国家和民族如何界定环境价值、如何在道义上对待环境，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的和定位。综观国内外的研

究，把环境价值分为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三类。其中，使用价值是环境为人类提供食物、药物和原料的功能，甚至包括环境间接地支持和保护人类活动和财产的调节功能。选择价值又称潜在价值，即环境为后代人提供选择机会的价值。存在价值则是环境独立于人之需要的生存权利。1992年以后，随着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价值评估和环境伦理讨论的深入，中国从只重视环境的使用价值转向越来越多地重视环境的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中国人倾向根据自己的处境和需要，从人类利益角度解释环境的存在价值。国家环境保护局主持完成的《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明确指出：“但人们对存在价值可作另一种解释，即：自然界多种多样，极其繁复的物种及其系统的存在，有利于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功能的保持及其结构的稳定，无论发生什么灾害，总有许多会保存下来，继续其功能运作，使自然界的动态平衡不致遭到瓦解。”人对环境的责任与义务，应当基于环境对人类的利益还是基于环境自身的存在价值？国际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大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即自然中心主义（包括土地伦理学和生物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环境伦理。前者认为，人类对自然尽道义上的责任和义务，不是为了人类，而是为了自然自身的、与人类不相干的存在价值；后者的观点则是，我们对自然界的道德义务，归根结底源于人类各成员相互间应承担的义务，也即源于人类利益，源于环境对人类的直接或间接的使用价值和潜在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与发展报告》在论述中国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时明确指出：“环境保护自身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让包括子孙后代在内的全人类在美好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的生活。”这表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环境伦理的形成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也有我国文化传统的必然结果。

(2) 节制使用环境和保育环境，抑制环境稀缺性。“节制使

用环境和保育环境”概念是建立在环境稀缺性基础上的。在人类活动规模和强度相对较小的历史时期，人类并不会感到环境在物理上的有限性。环境产品和服务自觉和不自觉地被认为是可以无限供给的。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常常就有这样的描述：“在外部世界中，有一些物品数量如此丰富，使用其一定数量于一个目的并不影响使用其他数量于其他的目的。例如，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即是这样的一种‘自由取用’的物品。”既然环境不是稀缺的，那么人类就无需节制利用和保育自然。然而，自然再生速度和环境的自净能力客观上是有限的。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人类索取自然资源的速度逐渐超过了自然资源及其替代品的再生速度，人类向环境排放废弃物的数量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各种环境问题逐步暴露出来。这终于使人们认识到环境是稀缺的。1972年人类环境大会是全球社会普遍认识到环境稀缺性的标志。我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于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这说明，我国的环境稀缺性意识主要始于70年代初。既然环境是稀缺的，那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建立阻止这种稀缺性的环境节制利用和保育机制。

(3) 可持续发展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转变发展方式。从全球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特别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人们通常把环境问题看作外部不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其解决方式一般是在谁污染谁治理或谁付费的原则下强调末端治理解决。末端治理虽然认识到应把环境问题纳入社会经济规划和政策中去，在社会经济规划和政策中把环境和发展统一起来；但是，在如何贯彻这种思想的战略上，强调的是把环境投资和环境资本积累纳入社会投资和资本积累中去。然而，由于环境治理活动本身在产生新的污染，这种对环境资本投资的战略陷入污染——投资——污染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解决环境问题。1987年，布伦特

兰夫人在其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调查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把环境问题看作“发展不当”的产物，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调整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布伦特兰报告的创新之处不在于其将环境问题有效地纳入社会经济规划和政策之中的思想，而在于贯彻这种思想的方法，即针对产生环境后果之发展方式的预防行动。中国早在 80 年代初就提出自然再生产的问题，强调把环境投资和自然资本积累纳入社会投资和积累中去。1992 年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提高和普及，中国对于发展与环境关系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这就是认识到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发展可以通过改善结构、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以及通过清洁生产与管理来降低单位产出对环境的冲击，还可以通过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来增加对更高的环境质量的需求，从而有利于环境保护；另一方面发展也会因经济规模扩大而增加对环境的压力。环境破坏实质上是强调发展数量、忽视发展质量即发展不当的产物，其解决途径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与发展报告》中，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而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的思想贯穿始终。随后外交部、国家环保局出台的《关于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情况及对策报告》明确指出：如果不改变长期沿用的以大量消耗资源、能源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环境问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可持续发展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转变发展方式。

### 三

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进展，我国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及相应的战略选择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我们认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包括相互关联的四个

主要方面，即自然保护战略、人口控制战略、增长方式转变战略和能力建设战略。

(1) 自然保护战略主张通过保持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支持系统、保存遗传的多样性、保证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永续利用，来维系环境容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国际上，这一战略是在1980年首先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发布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提出的。在我国学术界，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也是在80年代初。那时中国环境经济研究的两个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探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这一探索中，许多经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分别提出自然再生产的理论，认为它与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一起共同构成社会再生产的三个相互依赖的过程。在中国实施自然保护战略的基本依据是，自然生态不足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因素。中国人多地少，环境问题严重，水旱灾害频繁，因此，实施自然保护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自然保护战略的主要目标和内容包括：设立门类齐全、体系完善的自然保护区网络；重建生态环境，包括使全国适宜治理的水土流失地区基本得到治理，适宜绿化的土地基本植树种草，“退化、沙化、碱化”的草地基本得到恢复，建立比较完善的生态环境预防监测和保护体系，使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基本实现中华大地山川秀美；制定全国耕地保护计划，设立基本农田保护区，保护对我国生存和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农业生态系统；制定碧水蓝天规划，保护人民生命活动所必须的水和空气，等等。

(2) 人口控制战略主张通过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关于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一个很流行的看法是：人口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是产生各种不可持续性的根源。例如，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一份研究报告指

出：“造成生态平衡失调的第一性压力无疑是人口的压力，其他各种过度的经济活动往往由此而引起。”其主要依据是：① 从环境影响来讲，人要消费就要有满足其消费需求的生产，要生产就必须要有资源的投入，在现有的科学技术条件下也必然向环境排放一定的废物。因此，人口增长必然会扩大社会对资源的需求和环境压力。② 从经济影响来讲，新增人口要消耗一定社会产品。一方面，人口过快增长可能减少积累，妨碍资本形成、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以及人的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会增加就业压力和贫困。因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选择。当然，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对环境的影响并非只有不利的方面，它可以通过增加有效竞争程度和扩大有效需求规模，带来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从而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减少单位产出的废物排放量，给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

(3)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另一战略选择。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与发展报告》中所言，“对于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面临着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讲，贫困和不发达是环境退化的最根本原因”。这是因为：① 环境质量是一个与收入相关的弹性“商品”，随着收入增加，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也就会增加。由于我国人均收入低下，缺乏对优美环境的需求，人们既没有足够的意识也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改善环境质量。② 直到1997年，农民仍占中国人口的70%。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劳动力仍然是大多数农民的主要财富，“多子多福”的观念仍然严重地支配着大多数农民的生育行为。人口的高出生率、高增长必然对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因此，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把经济发展从过去主要依靠资源投入转移到主要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科学技术进步上来，从而使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